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三都水族

S A N D U S H U I Z U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水乡
调查与研究



程 瑜 主编
李 锋 辛宇翔 副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三都水族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水乡调查与研究

Sandu Shuizu

Guizhou Sandu Shuizu Zizhixian Tangdang
Shuixiang Diaocha yu Yanjiu

主 编 程 瑜

副主编 李焯锋 辛宇翔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叙述了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生产、婚姻与家庭结构、教育、社会结构、饮食文化、精神文化生活、乡土医学等各个层面。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马 岳 国晓健 装帧设计:臧 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都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水乡调查与研究/程瑜主编 —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47-096-5

I. 贵… II. 程… III. 水族—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三都水族自治县 IV. K28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9902 号

三都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塘党水乡调查与研究

程瑜 主编

李焯锋 辛宇翔 副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 01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mayue119@139.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二次印刷

字 数: 270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ISBN 978-7-80247-096-5 / G · 260 (215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由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老实实在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龙脊

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广南阿科——云南广南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

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目 录

总序（周大鸣）	i
风水应合 钟灵毓秀的塘党村（石国义）	1
塘党村的生计模式（龚虹铭）	13
塘党村之教育的调查研究（辛宇翔）	41
塘党村婚姻家庭的调查与分析（王文博）	67
塘党水乡社会结构调查（李焯锋）	83
塘党水乡的女性社会（罗旋）	107
塘党水乡的饮食文化（高洁）	136
塘党水乡的端节及其文化变迁（王文博）	160
塘党水族习惯法的变迁研究（文永辉）	167
塘党水族拜石信仰的人类学考察（文永辉）	182
乡土医学的人类学分析：以水族民族医学为例（程瑜）	192
附录	200
后记（程瑜）	220

风水应合 钟灵毓秀的塘党村

石国义*

塘党村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边远而封闭，但由于风水应合，较早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家族生态发育完整，民风古朴，形成修己爱人、群体本位的价值目标。同时名人效应又强烈影响着村民的政治心理，形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断驱动人格价值的自我更新。通过剖析该村的政治文化结构，可以较好地反映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水族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

一、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背景

（一）地理位置及生态环境

塘党，是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一个行政村，属恒丰乡所辖。距三都县城46公里。海拔平均在889米线上。其西面与荔波县边界接壤。村域东西宽7公里，南北长7公里。境内峰峦叠嶂，属喀斯特地貌。塘党寨所在的坝子是典型的溶蚀盆地。坝子及较平缓的山麓早被开辟成田，但无地表溪流，农田用水及人畜饮水都比较困难。然而地表资源和地下资源比较丰富。境内森林密布，长期以来虽多遭人为破坏，乱砍滥伐，但现在森林覆盖面积已达70%以上。用材林树种主要有马尾松、杉木、泡桐、樟树等。经济林树种主要有油桐、板栗、五倍子等。这一带原本是喀斯特林区，古木参天，林中动物有野兔、松鼠、黄鼠狼、野猫、狗熊、老虎、豹子、野猪、獾、野鸡、山雀、猫头鹰等。由于20世纪50年代，森林被大量砍伐，使它们失去栖息的场所，现所余存不多，虎、豹、熊等大型动物已经绝迹。塘党草山面积广，牧草资源极为丰富，大部分为草坡、草场、疏林草场，灌木丛草场，坡度不大，土层深厚，土质较好，山热条件好，草的青绿期长，为喂养牛、羊、猪、鸡等家禽家畜提供了自然的物质基础。所以塘

* 作者系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研究所前所长。

党村近年的畜牧业和林果场发展较快。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矿资源比较丰富，加上有天生优质的石灰岩，挖煤烧石灰供建筑和农田追肥，是塘党的传统产业。

塘党耕地面积不大，全村耕地面积仅780亩，而且其中田少地多，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旱地作物主要是玉米、辣椒、叶烟。特别是叶烟、辣椒自古以来就享有盛名。其辣椒色泽鲜红，皮薄肉厚，辣温味香，历来畅销荔波至广西河池等地市场，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叶烟产量高，色、味皆好，过去也一直畅销于荔波以至桂北地区。近年来，叶烟、烤烟同时并举，推广了科学技术，使用了化肥，产量大大提高，是塘党村近年来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行政村结构及人文历史背景

塘党村共辖7个自然寨，12个村民组。以塘党寨为中心，东面有打便寨、干水寨，均平行于南北向线上，与塘党寨相距均为1.5公里。这两个寨子都是水族，各12户人家，其形成的历史时间比塘党寨大约迟70多年。其族际关系也比较复杂，甚至在寨内可以通婚，血缘族亲与非血缘姻亲杂居，其文化心态与塘党寨多少有些差异。其特点是这两个寨子人口发展缓慢，文化素质偏低。以干水寨为例，从其开山始祖直至今天，尚无一个初中生。其主要因素是经济生活拮据以及旧的农民意识浓重，孩子读完小学后就索性回家务农。

南面分布两个自然寨：上弄尧、下弄尧，同位于东西向线上。其形成历史时间与打便、干水两寨略同。均属布依族、水族杂居的村落。其家族结构比较复杂。各姓氏家庭从不同地区迁到这里定居。其中覃、莫两姓居多，两个寨子各自也只有20多户人家。20世纪60年代，又有一部分韦姓水族迁进来，这样形成两种民族杂居的村落。由于生活上的往来交际，在民族语言、风俗习惯、伦理纲常诸多方面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趋于同一化。语言方面，从老人到幼童，都能用水语或布依语交谈，只是民族宗教信仰、传统风俗习惯多少有些保留，但近年来开始趋于接近甚至同一化。

塘党寨西面是塘滚寨，形成于清末年间。原仅两户人家（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里水源富足，水田多，是塘党村水稻产区之一，其拥有者原来塘党人占大部分。后来，原两户人家绝后，无人继承。人民公社时期，塘党寨划拨部分移民进驻这里，现在已拥有十多户人家。这里海拔较塘党寨低，幅员广大，森林覆盖面积占全村所辖面积65%，多半是经济林木，草坡上的草异常丰盛，为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西面距塘党寨2公里分布有拉威、瑶台两个村落，相互间距离2公里，平行于南北向线上，形成历史年代与塘党寨略同。拉威寨有一条小溪流过寨前，是

塘党村唯一得天独厚拥有河流的村寨，住户全是水族，而且家族结构单一，全寨只有两个宗族支系，寨子形成历史久远，其始祖从今天的廷牌镇迁进这里定居，和塘党寨可以联姻婚嫁。这里海拔比塘滚寨稍低，大半是水田。同时森林覆盖面积占总面积75%左右，主要是松、杉木，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瑶台寨位于拉威寨的北面同一线上，30多户人家，水族聚居，全寨分为三个支系宗族，其经济文化发展较拉威寨略快。森林覆盖面积占总面积80%以上，是塘党经济林的主要地区。与荔波县的布依族村落毗邻。又因自古以至1957年前一同隶属荔波县，历史上由于社会交往，使他们与那些布依族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民族关系融洽。尽管布依族与水族风俗、伦理、信仰以及语言各异，但彼此交往甚密，每当逢年过节、丧葬婚嫁，互相以财物赠送拜访，登门看望，民族与家族交际无异。

现在回述塘党寨：

塘党寨是塘党行政村的主体，共四个村民组，168户752人。关于塘党寨鼻祖最早迁徙到此定居的传说，要溯源于大约明代万历年间。据塘党北面山脚下遗存的一座古墓碑记载，亡者系塘党寨的开山始祖。碑文墓志称其籍贯为广西施恩（今环江县），后迁入荔波。传说这位始祖游历许多地方，最后迁至周覃“母金”（今周覃下院），不久又迁到“板留”（今恒丰乡板留村），在板留定居数代，后来由于人口增长，为扩大生存空间，有两位祖先又携带自己的妻儿到塘党来拓荒。关于“塘党”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这么一个传说：先祖韦雷最初到这个地方来，是在距现在塘党寨1公里远的深山中搭起草棚居住下来的，凭借肥沃的土壤，繁茂的森林草坡，以简陋的原始农具在这里进行刀耕火种，同时利用草坡牧牛喂马。时过不久，每天清早放牧的马匹一出门，便径直朝离这里2公里远的山坳里跑，年长日久，天天如此，为了弄清原委，先祖开始仔细观察山坳的一切。只见山坳四周群山环抱，坝中央荡漾一口偌大清澈幽深的大水塘，岩边青松绿竹，一派葱茏。四面群山，山山雄奇，峰峰挺秀，和这口塘相映生辉。这里还生长了一种叫“马党”草的野草，它气香味甜，马特别喜欢吃。马天天跑来这里吃这种野草，饮池塘里的清水。先祖感到这山坳是一处赖以生存的好地方，于是便举家迁到这口塘边，落居下来。天长日久，人丁繁衍，六畜兴旺，村落形成。始祖高兴，便把这口水塘和马爱吃的“马党”草各取其中一字将这里命名为“塘党”。

两位开山始祖定居塘党后，因看到这里条件较好，让尚在板留居住的另一位兄弟又迁进来。这样，塘党寨的形成就算是三位始祖开发的，他们是佣公、沃公和严公。塘党的三个支系便是这三位始祖的后裔。村落的南、北、西三面各

修一个寨门，由佣、沃、严三个家族各守一个寨门。直到今天，南、北、西三面依然是三位始祖的后裔们所聚居的宗支家族群落。

家族共同体的存在和活动，渐渐孕育出一整套的家族文化。例如，三位始祖原来就是同胞兄弟，所以塘党寨子里的人，都是以一个大家族而互相依存。但后来繁衍的人口多了，就演变成三个宗族支系。现在每当一个宗族支系里有老人去世，就由这个支系的子孙披麻戴孝，戒荤吃素。每逢端节，三个支系对三个始祖都举行公祭，并在除夕祭祖，戒荤吃素的风俗在塘党村也显得特别虔诚浓郁，形成一种宗教信仰。端节戌日这天，家家户户清洗家具，特别是清洗餐具形成一种宗教文化。打扫卫生，干干净净过节，固然是当今社会的普遍习俗，但在水族，特别是在塘党村，还有戒荤吃素，崇拜祖先的内涵。而且在祭祖的菜肴中鱼包韭菜是经典菜肴。鱼包韭菜的制作特别讲究，供祭祖先后拿来待客，又被视为待客上品。除夕祭祖时，老年人通宵达旦在供桌前厮守，灯火通明，香楮冥钱不断，以示虔诚。次日举行家族团拜，既表示对祖先的崇拜，又是家族活着的人互相祝福。这个古朴民风，在塘党村至今仍保留着。

在塘党村，虽分三个支系，但在称谓上一般来说，互相间不分支系而只按辈份来称呼，有事大都能互相协商和共同帮助。族内老人深受全族成员的尊敬和爱戴，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来自他们所处的地位和长期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来自全族成员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像在修房造屋、婚嫁乃至责任田粮食品种的选择等方面，都会参考他们的意见。在种责任田问题上，因老人阅历深、经验丰富，他们深知哪些田地适于栽种什么，以及下种时间，放肥的方法和力度，田地的干湿水分，通风向阳等方面，他们大都了解。所以，一是他们向族内晚辈讲传，二是晚辈主动征求他们的指点。可以看出，在塘党村，老人的地位相当高。不过，老人的地位虽高，但他们并不专横和武断，深通人情事理，处处事事都能体贴晚辈，族内关系相当融洽。

塘党寨的三个宗族支系从清代嘉庆年间就规定有人伦字辈：志、登、芝、学、国。清朝末年，随着后代递增又加五个字，即元、绍、锦、英、鸿。光绪年间，当时具有贡生学位的韦学霖又拟定增加五个字，即光、昭、万、世、荣。现在塘党寨韦氏家族最年轻出世的传至第九代“英”字辈。这样就确保后代子孙人伦有序，从字辈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宗族人口的发展状况。塘党寨家族的族谱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整理成文，后因世事的变化而失落。至90年代中期，经过重新整理，再现了其宗族人口发展的历史轮廓（详见塘党寨家族世系表）。

二、汉文化的浸润对塘党寨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汉文化教育，在水族地区，萌芽于宋代，发展于明代成化年间。当时在水族地区设土司官学，以土司、土目子弟为主要培养对象，造就科名仕宦以及书吏、通事（翻译）等人才，下层各屯设私塾，纯属儒学，以培养地方“知书识礼”的普通人才。其目的是“讲魂圣道，使渐月化，以复先之旧，即忠群尊孔”理论道德。清乾隆年间，水族各村寨办学之风四起，开始教授“四书”、“五经”等的启蒙教育。光绪年间，塘党村绅士韦学霖经乡试获“贡生”学位。而塘党村与他同一时代的许多学子，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建树，一批学仕习汉字、学儒礼蔚然成风。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或多或少影响着家族后代的子孙们。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有的家庭几代人都掌握文化而参与政事。举例如下。

（1）韦学霖，字宇臣（1887~1951），其父韦芝发虽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但他“望子成龙”的欲念极为强烈。他在塘党村率先请名师进村办学，加之学霖幼时天资聪慧，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声律启蒙”、“大学”、“中庸”等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理解力强，成绩出众。接着又到荔波县城就读公学。清宣统二年（1910）考入贵阳南明中学。在校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韦学霖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毕业后先是在塘党村设馆教学，后又在荔波县城自己宅第内桐油灯下开办“农民识字班”，教育农民子弟，宣传抗日道理。大门口上镶嵌着这样一副对联：“睁大眼孔观中外，站稳脚跟议古今”，在一片崇美恐日的风气中，这幅对联颇能显出国人应有的骨气。当时的县长韩知重很赞赏他这种舍己为人的义务教学。他就乘机向韩说：“欲完成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业，必须唤起民众；欲唤起民众，必须创办学校教之以文，学之以礼。”韩听他陈述之后欣然同意。1927~1930年他任贵州省议员，广交朋友，宣传他的教育救国主张。1931年离任省议员职务，考进贵州省第一期“区长培训班”。结业后，仍然用他绅士身份的功能积极推动他教育救国的主张。1931年鼓动当地各阶层捐资筹建恒丰国民小学。1934年，他受命任荔波县方村区长，更是利用官场身份和行政信誉，一方面上呈报告贵州省政府、独山行政公署和荔波县政府要求拨款，另一方面动员加摊派平民百姓献工献料，利用当时恒丰地区丰富的杉树木材优势构筑成典型民族风格的三合院式一楼一底土木结构的校舍。校舍南北两侧楼房各有上下4个标准教室，共8个教室。上下层教室之间订上双层楼板，中间铺木炭隔音。两侧教室山头砖墙封顶。两侧教室楼房之间砌上5米高石墙连接，形成封闭的方形天井校园。方形院内砌有四个相等的花台于四角，对应栽上桂花和紫荆花树各两棵。石墙正中开拱形校门。校门内正中矗立着35米高旗杆。校门外顶上横塑校名：“贵州省荔波县第二级小学”。

两侧楹柱直塑“普及社会教育，培养自治英才”的对联。校门外修下石阶五级开辟而成的篮球场。篮球场正中又修下石阶七级下到恒丰集市场坝。校舍北侧修一堵百米围墙。整个校园内外显出错落有致，花木扶疏，整齐典雅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恒丰小学校园建筑成为当时省内乡村小学房舍建设规范的典型。后来由新加坡爱国华侨商业巨星“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胡文豹两位先生捐资投建的“荔波瑶民小学”（即瑶麓），比恒丰小学亦有所不及。

恒丰小学的扩建成功，给国民党政府当时推行的所谓“地方自治”和“发展边疆教育”的口号，增添了“辉煌”的历史光环。所以，当时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曾为之颁奖并赠上“桑梓仪型，自治良才”的木质镏金巨幅贺匾。当然，恒丰小学的扩建，也确实对水族乡村的文化教育有历史的积极贡献。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至民国三十八年（1948），学校一直没有停过课，在校学生数一直保持400~500人左右。生源涵盖荔波、独山、三都边地的水族和布依族地区，学生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客家”（汉族）子弟，他们多是慕名而来这里攻读的。据查，解放初期服务于社会的一些水族基层干部、教师、下级军官等多数是从恒丰小学毕业出去的学生。恒丰小学历史上的辉煌，不可否认韦学霖为它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1950年荔波第二次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即派员到恒丰小学接管，开门复课，更名为“贵州省立荔波民族小学”，由贵州大学毕业生、荔波县福利村人玉成瑞先生出任“贵州省立荔波民族小学”第一任校长，经费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直接拨给。贫下中农学生就读有助学金，特困学生有寒衣、睡被补助，成绩优异者还有奖学金，不仅如此，新中国出版的新图书、教学仪器及音乐体育器材如篮球、排球、乒乓球拍、脚踏风琴、手风琴、幻灯机等都由省民委直接购物配发，国民党时期恒丰小学的“辉煌”当然是与解放后的民族小学不可同日而语了。

（2）韦学盛，号振德（1867~1949）。幼时进入乡村庠学，天资聪颖，学业精进。16岁时，其兄韦学大被地方土匪杀害，韦学盛悲愤填膺，自编12双草鞋徒步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赶赴贵阳省会投诉状书，要求官府缉拿凶犯，事后凶犯闻讯逃亡他乡。韦学盛后来多年为乡政官，正直清廉，多次为平民百姓昭雪不白之冤，在本地区享有盛名。1931年韦学盛已属六旬有四，卸职回家赋闲，被韦学霖聘为恒丰小学扩建管理员，掌管财经，收纳捐款，收集保管建材等工作，韦学盛一直坐镇恒丰，很少回家。学校修建竣工后，韦学盛已年迈古稀，当年告老回家，颐养天年。韦学盛虽一生中大半时间参政，但一直两袖清风，没有给子孙置田产、起高楼，与寨上平民百姓一样过着清贫生活，他一生的德范